

“疑古”与“走出疑古”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商务印书馆

文史哲丛刊

“疑古”与“走出疑古”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古”与“走出疑古”/文史哲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文史哲丛刊)

ISBN 978-7-100-07177-2

I. 疑… II. 文… III. 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04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疑古”与“走出疑古”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177-2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35.00 元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目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目 录

“疑古”与“走出疑古”

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宋 健 3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杨春梅 17

“走出疑古”的困惑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张富祥 71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 淳 100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江林昌 131

“疑古”学说论衡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李扬眉 147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彭国良 186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李幼蒸 210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吴 锐 254

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常玉芝 285
----------------------	---------

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 曹 峰 317
------------------	-------------

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	--

.....	〔日〕池田知久 西山尚志 345
-------	------------------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沈颂金 370
------------------	---------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	--

.....	谢维扬 385
-------	---------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曹 峰 404
---------------------	---------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陈泳超 437
--------------------------	---------

河洛讖纬与刘歆	葛志毅 460
---------------	---------

附 录

“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童书业 483
-------------------	---------

“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杨向奎 490
---------------------	---------

后记	501
----------	-----

“疑古”与“走出疑古”

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宋 健

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热烈支持。自忖历史知识浅薄，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想到，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类珍贵的遗产。读史爱国，人人有责。在“工程”开始实施之际，不揣浅薄，发一点议论，奉闻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实出自为历史科学效劳的至诚。

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五千年历史进程的炼凝荟萃而成。欧洲人也认为希腊史诗是他们文化的渊源。欧洲的伟大文学家，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借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题材，创造也不朽的作品。欧洲各国现代语言中充满了与古代神话和历史有关的词汇，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商业中，如“阿波罗”登月，“三叉戟”核潜艇，“阿喀琉斯之踵”等等，比比皆是，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最近，2月4日，尼泊尔政府发表公告云，五国考古学家发掘证实，佛祖释迦牟尼公元前623年降生地在尼泊尔南部兰毗尼园菩提树下，是“惊人

4 “疑古”与“走出疑古”

的考古成就”。比兰德拉国王伉俪立即去现场主持仪式，耗巨资创立国际研究中心，可见事态之重大。

几年前我访问印度，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Dr. Mostafa Tolba, 埃及人)和我一起参加印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托兴奋地致词曰：“我们，三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代表欢聚，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保护环境是我们古代文明的要义。”听他的话，不胜荣幸。

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我读科学史多些。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公开声明皈依中国文化，并解释道，这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1986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惠赠我《李约瑟文集》一册，是潘吉星先生编译的，由他本人作序，答名为“十宿道人”——李约瑟。伴他来华的新闻记者坦普勒(Robert K. G. Temple)也送我他写的书，叫《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China: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1986)。书中有一段话，标题为“西方欠中国之债”，大意是，李约瑟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当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它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这些话，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荣耀。坦普勒用的不是科学家的语言，但这与马克思的话是一致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战乱、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东周列国,争战五个世纪,处士横议,诸子百家,文伦大爆发。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灰未冷山东乱,接着是汉文化的大繁荣。两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三百年,涌现出一大批数学、天文、医学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至12世纪宋辽金元族际争斗又两百年,民族文化未被窒息,仍有悲壮浑雅的金格元曲传世。据水利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国发生过1029次大水灾,一片汪洋,生灵殆尽;发生过1056次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华文明是任何灾难都打不断的链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碍她的生存和发展。她是一部长卷史诗、无穷画卷,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技术的不尽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溶化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与李约瑟院士同时代的很多中国老一代科学家都作出过重要贡献。现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都有一大批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李约瑟院士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并不是终结。后人仍将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和启迪。吴文俊院士近年关于数学定理的机械化证明,取得世界公认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九章算术》和现代计算机的成功结合。

近读李学勤同志的《走出疑古时代》，使人强烈感到，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最大的缺憾是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前 841 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日本人有《尧舜禹抹煞论》。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论者称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不见科学面目。

英人罗伯兹(J. M. Roberts)编著、1993 年出版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 8 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他还说，商朝于公元前 1700 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 4 万平方英里(104000 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今天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前 1027 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所指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 G. Starr)等编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64)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晚，是受到后者影响而发。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炼铁技术是 1000 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作者们说，商年代为公元前 1523 年至前 1027 年，安阳出土文物是唯一的物征。

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部分历史学家可能除外，对外国人的这些说法会愤斥之为浅薄。读了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

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太史公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匱,广采民间遗存,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深考论次,忍辱负重而作千秋《史记》。自清末以来,中国治史学者对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书》、《礼》等文献记录,有信的,有疑的,有释的,也有根本否定的。作为外行读史,我从几本可靠的典书中摘记少许如下。

由毛主席倡议、周总理督编的《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把五帝、夏都列为“传说”。夏、商的年代后画上了(?)号。夏代遗迹视为“假设”。

郭老 1929 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世界古代史比较表一张。前 21 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前 17 世纪栏内也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个字。表中不见了五帝,忽略了黄帝。

有近代史学家自称为疑古派,索性改名为“疑古”,与十宿道人形成对照。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唐朝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认定中华文明从黄帝始,成为唐后 1000 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学者之共识。张守节还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四年共 2413 年,即黄帝纪元始于前 2510 年(《史记正义·序》)。吴泽先生将商代断为前 1766 年至前 1122 年,共 644 年。他说,“过去许多人终是喜欢无条件疑

古,好像夏殷周三代历史,‘文献不足’,‘靡得而记’不能研究,就是‘正史’里的《尚书》、《史记》等,有关夏代商代的历史纪事,也认为不足凭信。不作科学的考古,不触及史实,全盘取消,态度上是欠严谨的”。“《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名字与甲骨文中所载殷帝王的名谥,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体一致,无何差异。《殷本纪》所载殷帝王名谥、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给以证明不误了。”(《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 1951 年版)

尹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0 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 页)

最使炎黄子孙们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

陕西有黄帝陵,中华人文始祖的象征,近年正按国务院决定进行修葺。春秋以后两千七百多年来,赴黄陵祭祖者络绎不绝。汉武仙台,悠乎屹立。从秦文公(前 756 年)到清朝,历代帝王祭陵昭祖者史录 76 次,留存碑文 30 余方。

1894 年中日海战,清廷败签《马关条约》,割台湾予日本。台胞奋起抗争,抗日领袖丘逢甲“上书宰相毁苛约,落日来登黄帝陵”。

1937 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手书祭文,向轩辕黄帝宣誓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

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最后说：“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监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黄陵还存有鲁迅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为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签《辛丑条约》后，鲁迅愤书于日本。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纪录，名溢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很煞风景。

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重大事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关。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在东京办了《民报》。为与清朝划清界限，改用了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义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在首页印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于12月29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09年。依此，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2698年。这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由于《民报》的威望，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孙中山通电发出后，各省群起响应，各地报纸改用新纪年。但江苏的历史学家另有推算，认为1911年是黄帝4402年，江苏报纸采用了自己的纪年，比“法定”晚了207年。另有黄藻编辑的《黄帝魂》一书，初版于1903年，后多次出版，影响很大。其中刊

出由别的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民国元年定为黄帝 4622 年，比法定纪元又早了 13 年。可见，当时各地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后来黄帝纪元没有用下去，不知史学界意见不一致是否是原因之一。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去年，我访问非洲，途经埃及，杨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卢克索遗迹。从 1798 年拿破仑入侵时发现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于 1822 年译出，经过 100 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断代已基本解决。法、英、德国的考古学家作出了不小贡献。古王朝（前 3200—前 2700）的纪年是粗估。第三王朝孟菲斯时代（前 2750）精度为数十年。第五—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前 2400—前 2375）精度达到十年以内。第七—十王朝以后（前 2280—前 2050）精度已为数年。第十二王朝（前 1991—前 1786），是帕克（R. Parker）据古文献纪录：某王登位的第 7 年第 8 个月第 16 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 ± 6 年。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语），中国天文学家为何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古代天文纪录算出夏商周三代纪年？

去年访问以色列，认识了以科学院副院长特德莫（H. Tadmor）。他是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他出生于哈尔滨，视中国为半个故乡，对中国古代史兴致很浓。他给了我一个材料，由于 19 世纪中叶识译了亚述巴尼拔（前 668—前 625）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学，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前 2378—前 2371）以后的精确纪年。对古亚述（公元前 3100—前 1600）是粗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纪录算出来的（H. Tadmor, *The*